

### 一、出訪莫斯科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宋慶齡和陳友仁等一行乘坐的輪船到達海參崴。<sup>80</sup>然後，他們改乘蘇聯政府提供的專用列車，在西伯利亞鐵道上經過漫長的旅途生活，於九月六日抵達莫斯科。<sup>81</sup>一路上，列車所到的每個大車站，宋慶齡都受到成群結隊的蘇聯人民的熱烈歡迎。莫斯科歡迎場面之熱烈，更為動人。蘇聯黨政領導人、各界群眾代表、旅俄華僑和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等歡迎隊伍，很早就來到雅羅斯拉夫斯基車站等候。列車進站時，樂隊高奏《國際歌》，歡迎的人群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列車停穩後，蘇聯政府外交部長李維諾夫，教育部長柯倫泰夫人，宋慶齡和孫中山的老朋友、蘇維埃中央政府代表加拉罕及莫斯科蘇維埃代表波波夫等，走進車廂親切迎接。當宋慶齡等沿月臺步行出站時，周圍群眾又伴隨著熱烈的掌聲擁圍上來。

80 上海《大公報》、《申報》，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

81 《東亞週報》第十七期，第二百五十七頁，一九二七年九月出版。

蘇聯人民不是把宋慶齡當作失敗的逃亡者，而是作為革命英雄而熱烈歡迎的。宋慶齡對此深受感動，使她進一步增強了對中國革命的信心。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她再次訪問蘇聯時說：「三十年前，當我到你們這裡來的時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為了抗議對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和對中國革命的背叛，被迫離開了我的國家。但是，當我一踏上了蘇維埃的土地，就知道我們事業並沒有全部失敗。蘇聯人民的鼓勵使我確信，我們的革命雖然在當時處於低潮，但是它會再一次高漲起來，人民是會勝利的。」<sup>82</sup>

據兩位在孫中山逝世時曾見過宋慶齡的中山大學學生說，這次在莫斯科看到宋慶齡的臉上露出了「憂傷神情」，而且「比兩年前孫博士逝世後更甚，這無疑是她在失去他和她丈夫為之操勞的中國革命後的一



一九二七年八月，宋慶齡抵莫斯科時受到群眾熱烈歡迎。



一九二七年九月六日，宋慶齡抵達莫斯科時在火車上留影。

種反映」<sup>83</sup>。在隨後的談話中，又看出她「對國內時局異常悲憤，但對革命前途並沒有灰心失望」。<sup>84</sup>

出火車站後，宋慶齡一行由李維諾夫和柯倫泰夫人陪同，乘車到紅場的大都會飯店下榻。

宋慶齡抵蘇聯後，繼續進行反對國民黨反動派背叛孫中山革命事業的鬥爭。由於擺脫了國內惡劣的環境，她在莫斯科開闢了一條更加有利的戰線，可以更加主動和及時地抨擊南京政府的一切倒行逆施，捍衛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

在一九二七年九月的一箇月中，宋慶齡連續發表的聲明和文章有八篇之多。在這些聲明和文章中，她明確表示自己代表「國民黨左派」或「革命的國民黨」，向蘇聯各界人民致



一九二七年八月，抵莫斯科時的宋慶齡。

83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一百六十七頁，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〇年版。

84 屈武：《採比金石，節礪冰雪——回憶宋慶齡同志》，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

意，感謝蘇聯政府和人民近幾年中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合作、指導和援助。並表示今後要繼續執行孫中山的「聯俄」政策：「我深信我們將繼續並肩作戰，打垮我們的共同敵人——世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勢力。」<sup>85</sup>。對國民黨反動派所採取的驅逐蘇聯顧問和誣蔑蘇聯「借援助之名，行顛覆之實」，以否定孫中山的「聯俄」政策的罪惡行徑，給予有力的回擊。

宋慶齡對國民黨反動派最沉重的打擊，莫過於在聲明中向全世界揭露中國新的掌權者背叛革命的真相，指出其必然失敗的命運和中國革命再起的希望，呼籲世界人民繼續支持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她憤怒地指出：「幾個月以前，廣大的長江中部地區還是為反抗世界帝國主義爭取自由而鬥爭的中心，但今天已經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中。那些以前被群眾信任為國民革命領袖的人物，現在卻領導著這個可恥的反革命。這對於中國來說，確是莫大的污辱。」宋慶齡又說，由於大革命失敗，世界各國人民感到迷惑了，他們希望領導革命人民的人能夠對這次革命的性質和目的加以說明。所以她這次訪問蘇聯的另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全世界明瞭，那些盤踞在長江流域的人，雖然自命為中國國民黨的發言人，但他們並不能代表革命的國民黨，也不能代表中國的革命群眾」。她莊嚴地向全世界宣佈：「我代表中國的革命群眾，前來說明：雖然中國的革命暫時喪失了它已經取得的地區，但它仍然堅強有力、朝氣勃勃、充滿信心」，「我所代表的革命的中國，與目前盤踞長江流域的封建官僚軍閥截然不同。

這些人已經脫離群眾，為了個人的利益和權勢正企圖把中國拉回到軍閥混戰的老路上去，造成了混亂。但是這僅僅是表面上的混亂。在目前表面的混亂下，存在著一股根深蒂固的、堅強地組織起來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聲很快就會響遍全世界。」<sup>86</sup>

面對現實，承認革命失敗，又看到敵人的弱點，看到革命再起的希望和道路，甚至擁護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這是宋慶齡當時基本的政治態度。

她認為「中國的局勢是沒有絲毫理由可以感到失望的」，因為革命的失敗「純粹是表面的」。從地理上看來，這個失敗似乎很大。但在那些地區，國民黨反動派的權力並不鞏固。「另外一個使人不會氣餒的基本事實就是人民的堅強組織。凡是國民黨控制的地方，中國的人民都已經覺醒了……今天他們正挺起胸膛以堅決的鬥志來面對未來。」<sup>87</sup>

宋慶齡這裡指的就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她說：「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實現，整個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進展。因此，誰反對土地革命，反對千千萬萬的農民獲得經濟解放，誰就站在反革命陣營那邊。」<sup>88</sup>

就這方面而論，宋慶齡的立場，遠遠超過國民黨左派一般的立場。她發展了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成為孫中山之後中國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

86 《在莫斯科發表的聲明》（一九二七年九月六日），載《宋慶齡選集》第三十一、三十二頁，中華書局出版。

87 《中國目前的形勢》（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載《宋慶齡選集》第三十五頁，中華書局出版。

88 《在莫斯科發表的聲明》（一九二七年九月六日），載《宋慶齡選集》第三十一、三十二頁，中華書局出版。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更為傑出的是，在大革命失敗後，多少「英雄豪傑」迷失方向、步入歧途的情況下，宋慶齡上述對中國形勢清醒的觀察和深刻的分析，對革命前途樂觀而正確的預見，不僅在國民黨中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比起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個別領導人也高出一籌。

向世界人民說明中國形勢的真相，表示中國人民繼續革命的決心，是宋慶齡堅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把國內已經失敗了的革命繼續進行下去的一個重要方面。此外，她還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演說，鼓勵學生永遠忠於孫中山的遺訓，就是其中之一。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蘇聯政府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而創辦的。取名「中山大學」是為了紀念孫中山。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六十六次會議上正式宣佈建立中山大學，並在廣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選拔學生，第一期就選拔了三百四十人，然後分批派往蘇聯。他們都是國民黨員、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其中不少是國民黨高級領導幹部的子弟，包括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

拉狄克任中山大學第一任校長。根據他的提議，中山大學由蘇共中央和國民黨中央共同管理。邵力子當時是國民黨常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他就兼為國民黨常駐中山大學理事會成員，代表國民黨監察中山大學。在學生中，分別成立了中國國民黨支部局和中國共產黨支部局，所以，中山大學又是國共合作革命統一戰線的產物。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七二五」事件後，國民黨反動派大肆攻擊蘇聯援助中國革命的政策，中山大學首當其衝。七月二十六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聲明取締中山大學並與之斷絕一切關係。

宋慶齡堅決反對這一措施。她到莫斯科後不久，就由陳友仁陪同，到坐落在沃爾洪卡大街著名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對面的中山大學，探望中國學生，併發表演說。

由於學校設在赤都莫斯科，廣大學生還保持著當年入學時的革命激情。在武漢政府反動，宋慶齡、鄧演達分別發表演說離開武漢時，學生中的全體國民黨員聞訊後曾集會作出決議致電宋慶齡、鄧演達，擁護他們二人的聲明，呼籲他們留在武漢堅持鬥爭，電報譴責國民黨內領導人的背叛行徑，明確表示「毫不含糊地維護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並敦請宋慶齡、鄧演達把工農聯合在中國國民黨的周圍，「為貫徹實施我們領袖的三大政策而奮鬥」。<sup>89</sup>當時，由於宋慶齡和鄧演達已經離開武漢，所以不能對這個電報作出反應。現在，宋慶齡當面來向學生們講話，大家無比激動。

一位當時在場聽宋慶齡演講的學生後來回憶說：

「中山大學學生，尤其是女同學，對她的卓越表現充滿自豪之情……她的舉止、美麗和嫵媚，激起了我們大家陣陣敬愛。孫夫人是廣東人，但一口地道的上海話，那天她用上海話給

我們講話。我記得，她深切感謝應邀來訪問國外第一所用她已故丈夫命名的中國人的大學。她告訴我們，她看到有這麼多對革命虔誠的年輕人，竭盡心力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衷心感佩』。她要求學生們永遠牢記，『我們是孫中山的信徒，我們曾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學裡受過訓練』，她敦勸大家，『千萬不要忘記，孫中山的最寶貴的遺訓就是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即聯俄、容共和扶助農工』，『只是在孫博士實行三大政策以後，實現三民主義的動力才得以增加，國民黨才得以新生』。他還回憶說：『無論從哪方面說，她都是一位有本事的演說家，她的講話音調清脆悅耳，咬字清晰，不時為我們的掌聲所淹沒。她給聽眾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熱烈印象。』<sup>90</sup>

屈武回憶說：「宋慶齡同志的演說，贏得了聽眾的熱烈掌聲；但卻有些激烈分子，批評孫中山的主張不夠徹底。宋慶齡同志當場予以駁斥，並嘲諷他們患了左傾幼稚病。我當時就感到她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女性，不愧為孫中山先生的忠實繼承者和勇敢捍衛者。」<sup>91</sup>

宋慶齡講話後，陳友仁也發表了演說。他作為一位革命外交家、武漢政府的外交部長，主要講述了他當外長時與列強進行外交鬥爭的事情，受到學生們熱烈歡迎。

由於國民黨政府堅持取締中山大學的反動立場，更由於後來托洛茨基反對派控制了中山大學，一九二八年暑假後，蘇聯政府終於決定停辦中山大學，並根據史達林的「國民黨反共，

90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一百六十八、一百六十九頁，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〇年版。

91 屈武：《操比金石，節礪冰雪——回憶宋慶齡同志》，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



我們則要給中國共產黨辦一個大學」的指示，共產國際決定將中山大學撤銷。其時，原中山大學內國民黨送去的學生都已回國，留下的主要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团員。

## 二、醞釀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

宋慶齡高舉孫中山的革命旗幟，繼續進行中國革命的另一重要行動，是她與鄧演達、陳友仁一起發起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

鄧演達與宋慶齡一樣，是國民黨中傑出的左派領袖。他是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個重要人物，擔任總政治部主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農工部長等重要職務。他堅決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堅持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曾在北伐戰爭中立下奇功，為武漢政府的鞏固和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他是這年的八月十五日到達莫斯科的。

他鄉遇故知，宋慶齡、陳友仁與鄧演達在莫斯科相會，十分高興。他們經過幾天回憶和分祈，認真研究我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教訓，認為除帝國主義勾結一切反動勢力向正在爭取解放的中國人民進行反撲之外，國民黨本身組織的不健全，不斷受到封建勢力的侵入、腐蝕，大大削弱和妨礙了革命的進展，是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經過幾個月的鬥爭實踐和觀察，他們認為大革命雖然遭到失敗，但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必須繼續下去，因此，必須高舉孫中山首創的「國民黨」這面旗幟，繼續革命，不能讓它被反動派玷污了。這是作為國民黨左派責無旁貸的義務，也是宋慶齡對孫中山最好的紀念。然而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是一場

長期的、嚴酷的鬥爭，散兵游勇似的與他們周旋，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必須重新組織起來。為此，他們決定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與國民黨反動派徹底決裂，把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旗幟奪過來，同時努力健全國民黨本身的組織，防止投機分子潛入。

根據他們三個人討論的結果，鄧演達起草了《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十一月一日，由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三人署名，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在莫斯科發表。

宣言明確表達了他們三人對當時中國革命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看法。關於形勢，宣言認為當時是「帝國主義者由消極的暗助反革命勢力的時期，進入到積極地進攻中國時期」。宣言分析造成這種黑暗局勢的原因，是由於蔣介石、汪精衛集團的背叛。他們竊取中國國民黨的旗號，偽裝成三民主義的擁護者，「其實已為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民眾之仇敵」。為此，宣言重申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意義，總結了孫中山「一面與敵人的奮鬥，一面須與黨內



一九二七年與鄧演達（右一）等在蘇聯合影。

叛徒決絕」的歷史經驗。關於革命的動力和物件，宣言指出：「中國被壓迫剝削的革命民眾為：工、農、手工業者、小商人及青年學生。其對抗的仇敵為：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地主、土豪劣紳及與他們相勾結之高利貸資本家。」宣言認為中國民主痛苦的根源在於：「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地主豪紳，及大部分與他們聯合的高利貸資本家的共同勾結所構成之中國政治經濟勢力的統治。」為此，宣言表明他們繼續革命的設想是：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繼承孫中山遺志，團結、領導被壓迫被剝削的革命民眾，向新舊軍閥和一切反動仇敵作鬥爭，建立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政權，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把中國人民從黑暗痛苦的生活中解放出來。

宣言認為當務之急是把國民黨這面旗幟從反動派的手中奪過來，所以臨時行動委員會的任務是：宣告南京、武漢國民黨中央的罪惡，終止其職權；籌備召集各省市代表大會，選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籌備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以解決一切革命問題。<sup>92</sup>

可以看出，當時宋慶齡與鄧演達等人對挽救國民黨以復興中國革命，是充滿著激情的。他們以為孫中山晚年挽救國民黨的歷史能夠重演。

當時中國各個革命黨派都在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探索繼續革命的道路，並且得

出各自的結論、制訂各種各樣的綱領。比較起來，上述宋慶齡等人的綱領，在形勢估計、革命動力和物件等方面的看法，是比較正確的，與第二年六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制訂的綱領中的有關表述也是相接近的。

發起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宣言發表以後，宋慶齡立即開展了與蔣介石反動集團針鋒相對的鬥爭。

### 三、反對蔣介石與蘇聯斷交

蔣介石沒有想到在他指派的特務嚴密監視下，宋慶齡竟然成功地出訪莫斯科，對此感到無比懊喪。但是他決不甘休。他深知宋慶齡對於剛剛建立的南京政府的價值。正如美國著名記者約翰·根塞(John Gunther)在一九三九年訪問中國後所說：宋慶齡「是宋家最重要的人物，因為宋家的一切勢力都是由她這裡發展來的；假設她不和國父孫中山先生結婚，其餘的姐妹兄弟們就不會有現在」。<sup>93</sup>所以，蔣介石不管宋慶齡一次又一次發表譴責他的聲明，依然把她當作國民黨「中央委員」對待，不斷地向她發出函電，通報他們的一些決定；同時還大肆造謠，製造所謂「醜聞」對宋慶齡進行人身攻擊，妄圖迫使宋慶齡向他屈服。但宋慶齡早已領教過蔣介石的這些伎倆，所以對此一概不予理睬。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反蘇行動進一步升級，他們誣衊共產黨發動的廣州起義是受蘇聯領事館所煽動，派兵圍攻廣州蘇聯領事館，最後竟悍然決定與蘇聯斷交。當蔣介石把與蘇聯斷交的決定電告宋慶齡之後，宋慶齡認為這個問題涉及捍衛孫中山聯俄政策的原則問題，絕不能沉默，即於十七日覆電蔣介石予以制止。她斥責蔣介石，指出如果與俄絕交「非惟自殺，實使黨國孤立無援，後世歷史上將以君等為誤黨誤國之罪人」！她希望蔣介石等「靜心三思，幡然覺悟，緩行前議」。她說她正準備回國，如果蔣介石不聽規勸，她「只得暫留此間，以表示反對此種無道義之自殺政策」。<sup>94</sup>

蔣介石自然不會改變他們的決定，但卻急切希望宋慶齡回國，妄圖加以利用。為此，除慫恿宋母倪珪貞連發數信催促宋慶齡回國外，他又於十八日再電宋慶齡，對她進行攻擊，誣衊她在莫斯科的停留和她的電報都是受別人脅迫的結果，挑撥性地要求宋慶齡回國「親自陳述自己的意見」。

宋慶齡接到電報後怒不可遏，立即在二十三日覆一長電，對蔣介石的謾言予以嚴厲駁斥。她說：「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臟莫斯科是自願的，就如同我的訪問是一種對國民黨領導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願抗議一樣。說我似乎是在別人的迫使下行事，這完全是誹謗和對我過去所做工作的侮辱。」她闡述了自己決定與蔣介石集團決裂的原因，再次強烈譴責他們背叛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新報》登載宋慶齡在莫斯科致蔣介石電，斥責他與革命的蘇聯絕交的「自殺政策」。

革命的罪惡行徑，指出：「這次互通電報證明，我們之間交換看法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們之間的分歧猶如一道鴻溝。你同蘇俄斷絕關係（保持與蘇俄的友誼是孫中山遺囑中竭力主張的政策），然而，你卻完全無意同帝國主義列強斷絕關係」；而且「被稱為國民黨執行委員會的這個機關已經成了帝國主義的同謀」。最後，她明確表示：「如果我回國的話，那也只是為了參加工農鬥爭……我將踏著革命者的足跡繼續前進，這是緬懷我們領袖的唯一道路，我在這條道路上決不回頭。」<sup>95</sup>

這份電報，表明著宋慶齡的堅定的革命立場和磊落的政治胸懷。她「言必信，行必果」，雖然母親連續多封信的催促，她決定暫不回國。從違背家庭與孫中山結婚那天起，她就革革命利益放在家庭私情之上。宋慶齡說，他們怕我「赤化」，不願我多待，我卻要堅持下去。<sup>96</sup>儘管回國有優裕的物質生活，而在國外則生活艱難，甚至經濟來源也即將中斷，但她決不後退一步。正如約翰·根塞感歎的那樣：武漢政府被顛覆後，「她在國外留居多年，雖然假設她肯要求的話是可以得到任何職位的。她不顧身體健康的任何斫喪，唯有從事於她所認為孫中山的主張而奮鬥。她放棄了家庭，放棄了財產，放棄了權利。任何婦人都不能比她再能不顧犧牲的了」。<sup>97</sup>

宋慶齡拒絕參加國民黨和南京政府的工作，決不為反動派張目，但她對有利於革命和人民的工作則是熱情支持的。正是在蔣介石催促她回國的時候，國內蔡元培等人發起成立「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收容教養在國民革命中犧牲烈士的子女親屬，並提議由宋慶齡、蔡元培、何香凝等九人為籌委，在南京戶部街設立籌備處。他們就此事徵求宋慶齡的意見時，她把這個學校的創立視為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紀念，因此欣然允諾。這一遺族學校經過籌建、招生後，於一九二九年四月在南京大倉園臨時校舍正式開學，宋慶齡擔任校長。<sup>98</sup>

96 李雲：《三十年代在慶齡同志身邊工作兩年》，載《解放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97 「美」約翰·根塞 (John Gunther)：《亞洲內幕》(上卷)第三百八十一頁，重慶時興潮社一九四一年版。

98 儲子潤：《深切懷念宋慶齡校長》，載《團結報》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儲子潤是原遺族學校教務主任。

宋慶齡視烈士子弟為自己的兒女，關懷備至，使孩子們在這所學校裡重新得到家庭的溫暖。一個學生這樣回憶說：「一九二九年春，我被送進學校，老師把我的破舊衣服鞋帽完全換掉，穿上學校發的新衣服，從襯衫、襯褲直到罩衣、罩褲，全是新的。我高興得笑著、跳著……宋校長，您對我們遺族學生教養的恩情，比母親還溫暖啊！」<sup>99</sup>

一九二九年宋慶齡回國到南京參加孫中山奉安大典期間，還由妹妹宋美齡陪同特意到學校看望師生們。那天，她身穿黑色長旗袍，臂系黑紗，面容莊嚴。她對老師說：「我們的學校是為紀念中山先生革命事業而設立的，新校舍建築在中山陵墓附近，教育的對象是追隨中山先生革命的先烈遺族，因此一定要為徹底實現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和教育主張而努力工作。」<sup>100</sup>可見，她支持在南京創辦這所學校，正是為了同國民黨反動派爭奪對青少年的影響。

#### 四、在異國飽經憂患

宋慶齡暫不回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莫斯科她也不想再繼續住下去了。

在莫斯科，她的生活得到蘇聯政府和人民友好而熱情的安排。在大都會飯店下榻幾天後，宋慶齡和雷娜·普羅梅一起搬到紅場附近豪華的蘇維埃旅館居住。這座旅館被稱為「糖業大廈」，是沙俄時期用糖業賺取的利潤撥款建造的。一九一七年以後，這座大廈被蘇維埃政府接

99 儲子潤：《深切懷念宋慶齡校長》，載《團結報》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儲子潤是原遺族學校教務主任。  
100 同上。



管，一部分作為高級官員的住房，大部分房間被政府用來接待外國客人。宋慶齡住在這裡是很方便的。大都會飯店中她原來住過的住房，就作為她辦公和會客的地方。陳友仁一家仍住在該飯店的二樓。蘇聯政府特派柯倫泰夫人<sup>101</sup>任招待組組長，負責照料宋慶齡的生活並協助她與各方面的聯繫。宋慶齡的意見和要求，也由她轉告蘇聯當局。對當時中國革命形勢的分析和估計，對武漢時期所發生的一些偏差，對土地問題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長期性等等，宋慶齡都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見。蘇聯外交部也派有專人關心宋慶齡的生活，特別在飲食方面，知道她有喜歡吃水果的習慣，每隔一天就派人送來高加索產的葡萄、蘋果等。

宋慶齡經常作為貴賓被邀請參觀訪問和觀看高水準的各種演出，如到彼得羅夫斯基公園觀看精彩的軍事演習，到大劇院欣賞著名的芭蕾舞等等。

不過，當時蘇聯國內複雜的政治形勢和她謙遜的品質，再加以流亡生活的微妙地位，使她在參加這些公共場所的活動時，帶著沉重的精神負擔。她唯恐群眾認出她來，更不願意宣傳自己。好幾次在大街上她被人們所注視，因此她很少上街。蘇聯外交部撥出一輛小汽車，供她在逗留期間使用。她每次坐進汽車總是把窗簾拉下來，以便盡可能隱蔽她在莫斯科的行動。有一次，她被普羅梅和文森特·希恩硬拉著到一家電影院觀看她本人到達莫斯科的紀錄

101 柯倫泰夫人出身於沙俄貴族，早年參加革命，頗受列寧的器重。後來，她選出任蘇聯駐瑞典大使，是蘇聯的第一位女大使。

片。由於她一向很謙虛，所以當看到自己的形象在銀幕上反覆出現，以及她發現周圍的觀眾已經認出她時，她的精神越來越緊張，終於沒有等影片放映完，就中途退場了。<sup>102</sup>

同那些在公共場所的活動比起來，她最樂意的是多次被邀請到蘇聯革命元勳、中央政治局委員加里寧的鄉間別墅去作客。在這裡，她可以避開公眾的注意，心情舒暢地欣賞鄉間的景色。這個別墅離莫斯科大約只有四五公里，坐落在阿爾漢格爾斯克村。去時，都是加里寧夫人葉卡捷林娜·伊萬諾夫娜親自到旅館來迎接。加里寧夫人乘的車子是一輛三匹灰馬並拉的雪橇。當她們坐好後，馬夫就把一條輕毛毯放在她們的膝上，請她們裹好，以避風寒。加里寧夫人是一位非常好客的典型的俄國主婦，態度誠懇、親切，對中國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經常問宋慶齡生活上有沒有困難，對莫斯科的環境適應不適應？加里寧同夫人一樣好客。他們夫婦淳樸的形象和熱情的接待，給宋慶齡留下了美好而難忘的記憶。在以後的歲月裡，每當提到這次莫斯科之行，她都要提到加里寧夫人給她的溫暖和愉快。一九五二年底，宋慶齡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途經莫斯科時，還曾特意尋找往昔與加里寧夫人一起歡聚過的地方，抒發懷念之情。在她的上海及北京寓所裡，一直掛著她那次訪蘇期間與加里寧夫人、鮑羅廷夫人合影的照片。

生活猶似海洋，有時風和日麗，碧波蕩漾；有時狂濤惡浪，倒海翻江。宋慶齡在莫斯科

的生活，既有愉快和甜蜜，又有酸辣甚至苦澀。由於蘇聯國內和國際局勢的動盪，政治鬥爭激烈，宋慶齡又是各方面都想爭取的著名人物，再加上她和鄧演達等少數人在異國他鄉，處在極不穩定、十分敏感的環境中，因此，政治困擾和各種刺激不斷襲來，使她飽經憂患。

首先，蘇聯黨內正在進行的爭論和反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使宋慶齡左右為難。

從一九二三年開始，聯共黨內就列寧主義、國內建設和國際共運中的一系列問題發生爭論，產生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反對以史達林為首的蘇共中央及共產國際執行的路線。中國大革命的指導方針是這場爭論的一個重點。大革命失敗，托派認為是史達林錯誤路線的惡果，於是向史達林派發起猛烈攻擊。宋慶齡來到蘇聯時，正處於這場鬥爭的高潮中。上述屈武回憶宋慶齡在中山大學演講時，受到激烈分子的挑戰，就是這場爭論激起的浪花濺到了宋慶齡的身上。

托派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比西方資產階級更反動；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共產黨不應加入國民黨實行合作，至少在「中山艦事件」或「四一二」政變以後就應退出國民黨，成立蘇



宋慶齡在莫斯科與加里寧夫人（右一）合影。

維埃工農政權，單獨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等等。宋慶齡雖然對托派的基本立場並不同意，但對托派抨擊史達林對蔣介石、汪精衛有幻想、鬥爭不力等意見則顯然是同意的，直到「四一二」政變前夕，史達林還要人們相信蔣介石，擁護蔣介石；<sup>103</sup>「四一二」政變之後，又把汪精衛奉若神明，以致養虎遺患。

托派和史達林派都想爭取宋慶齡這位中國革命的有力見證人為自己說話。托派尤其強調蘇聯應積極支援世界革命（自然包括中國），反對埋頭國內的經濟建設。他們認為宋慶齡肯定會支持這樣的立場，所以很想利用宋慶齡來攻擊史達林。中山大學的中國托派學生就曾多次要求會見宋慶齡，希望她對史達林與托洛茨基的鬥爭表態。

宋慶齡自然不願為任何一方所利用，對托派學生的請求一一加以委婉地拒絕。

鬥爭愈演愈烈。十一月七日，宋慶齡應邀到紅場觀禮臺上觀看慶祝十月革命勝利十周年的盛大閱兵和遊行活動。遊行隊伍中的托派分子（包括中山大學學生中的中國托派），在經過主席臺時，當著史達林的面，突然打開擁護托洛茨基、反對史達林的旗子，接著兩派群眾又發生了鬥毆事件。

宋慶齡寄予很大希望的中山大學，當時成了托派大本營。校長拉狄克是托派的重要頭目，他在學校中安排大批托派教師幹部，培養了不少托派學生。有些學生因紅場事件被遣送回國，

103 史達林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莫斯科黨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講話，參見〔美〕羅伯特·諾恩和津尼亞·尤丁編著、王淇等譯：《羅易赴華使命》第六十一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隨即與陳獨秀取消派結合，發展了中國的托派組織。

托洛茨基與史達林兩派鬥爭結果，以托派慘敗告終。拉狄克被撤掉校長的職務；托洛茨基在十一月被開除黨籍，然後流放到阿拉木圖。宋慶齡的熟人、與孫中山共同發表過歷史性聯合宣言的越飛，也因此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自殺身亡。鮑羅廷回國後，成了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另一隻替罪羊（除了陳獨秀之外），遭到蘇聯執政者的批判，所以不能履行離華時議定的返蘇後與宋慶齡等共同總結革命失敗教訓的諾言，也很少與他們見面，有時只得派他的夫人探望宋慶齡；其他在大革命中曾到中國幫助革命的許多政治、軍事顧問們，與鮑羅廷一樣處境都不好。莫斯科中山大學也在後來被撤銷。所有這些，使宋慶齡深感失望和寒心。

其次，鄧演達受到衝擊，宋慶齡也感到有壓力。

鄧演達作為一個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與共產國際及史達林在對待中國革命及世界革命的問題上，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的觀點。中國大革命失敗，使雙方的矛盾明朗化了。

到莫斯科時，鄧演達曾受到蘇聯領導人的熱情歡迎，並與他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共產國際也為他召開盛大歡迎會，並請他作中國革命問題的報告。鄧演達在感謝蘇聯及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支援的同時，又坦率地表示反對對中國革命的干預。他認為中國革命純屬中國自己的事，「不應置放於第三國際的範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第三國際只可作友誼上的贊助，斷不能將中國解放的任務，完全任第三國際擺佈。這種民族自決的精神，在任何環境中，皆應

該存在的」。他所得的結論是：「共產主義革命，僅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適用，中國是封建經濟占主要成分的半殖民地國家，解決土地問題，實行耕地農有，是一個當前革命的主要任務，否則定然延長中國革命。」<sup>105</sup>

鄧演達在中山大學的報告也是如此。在長達四小時的報告中，他嚴厲譴責蔣介石和武漢領導集團，但同時也指責共產黨。「聽眾中的一些共產黨學生顯然被觸怒了，於是，用關閉電燈和腳踏地板來進行報復。」<sup>106</sup>

所以，當時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派人與鄧演達商談，爭取他參加共產黨時，他拒絕了；<sup>107</sup>而是與宋慶齡、陳友仁積極地發起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組織。

鄧演達的意見，反映了當時中國人、包括共產黨和國民黨中相當一部分人的看法，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慶齡的看法。他們認為武漢國民政府失敗得如此迅速，與當時武漢地區群眾運動中出現的那種超越民主革命的「左」的傾向有關；而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直接干預——羅易把「五月指示」洩露給汪精衛看，則是「七月失敗」的直接導火線。

一九二七年五月，武漢政府發生危機時，共產國際史達林給在武漢的代表羅易和鮑羅廷

104 轉引自《鄧演達先生傳略》，載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一九三二年出版的《鄧演達紀念集》。

105 轉引自《鄧演達先生的生活》，載同上。

106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一百六十五頁，現代史料編刊社一九八〇年版。

107 羅任一：《鄧演達回國組黨》，載《鄧演達》第一百〇六頁，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拍發一份電報——「緊急指示」，主要內容是：（一）堅決進行土地革命，通過農民協會，從下面奪取土地。（二）改組國民黨中央，從下面吸收工農領袖，代替正在動搖和妥協的老領袖。（三）動員兩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五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成一支可靠的軍隊。（四）組織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sup>108</sup>

這就是所謂共產國際的「五月指示」。

機會主義的羅易接到此電後，竟然違反組織原則，在未經中共中央同意之前，把指示提供給汪精衛看，妄圖依靠汪精衛來執行這個指示，以挽救革命。

汪精衛看後嚇壞了，認為這是要「共產黨消滅國民黨」，就把指示給國民黨的軍政官員們傳看，包括鄧演達和宋慶齡，動員他們起來反對共產黨；還到鄭州會議請求馮玉祥幫忙，要與蔣介石聯絡，以致形勢急轉直下。所以，汪精衛後來一直以「五月指示」為證據，宣稱他的反共是「被迫」的、「有理」的。<sup>109</sup>

鄧演達坦率地談出個人的意見，開罪了蘇聯當局和共產國際，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宋慶齡與鄧演達政見相同，因此對鄧演達的遭遇憤憤不平，心中不勝悵惘。尤其對蘇聯領導人不能容忍不同政見者的不民主作風，很不以為然。

108 《史達林全集》第十卷，第三十一、三十二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109 參見汪精衛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給宋慶齡的信；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在廣州中山大學的講話》，載《汪精衛選集》第三卷。

使宋慶齡最感悲痛的是普羅梅的逝世。從大革命的烽火歲月，到革命失敗後的艱險歷程以及在莫斯科的流亡生活中，普羅梅與宋慶齡同舟共濟、甘苦共嘗，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而且又是她身邊唯一的女友。但是，普羅梅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因腦炎不幸去世。宋慶齡對她的死悲痛欲絕。

在送葬那天下午，宋慶齡與大家一起走了幾個小時，穿過莫斯科市區去火葬場。當時天氣很冷，文森特·希恩在往前走的時候，發覺宋慶齡彎著身子「在顫抖」。因為她從中國的收入來源已經斷了，但她十分好強，不願接受不相識的人的幫助。她沒有過冬禦寒的衣服，在這天氣陰沉、一片冰凍的大街上，她只穿著一件單薄的黑色外衣。蘇聯外交部借給她的那輛小轎車跟在送葬隊伍的後面。汽車裡面至少暖和一些。希恩勸她乘上汽車，但她不肯。她完全是步行穿過莫斯科走完全程的。她低垂著頭，由於剛剛病癒不久，臉色極其蒼白。看到這種情景，希恩不禁意識到，「現在宋慶齡是最孤獨的流亡者了。她在薄暮中，在她的最無私的朋友的靈柩後面顫抖著」。<sup>110</sup>

的確，普羅梅去世後，宋慶齡在莫斯科更加孤獨了。她一直懷念這位難得的異國至交，以後每提到普羅梅，她都表示出一種難以抑制的傷感。

當然，最大的打擊，還是來自中國國民黨反動派。



蔣介石在拉攏宋慶齡失敗的同時，加緊了對她妹妹宋美齡的追求。由於宋家本身是一個人才和金錢的寶庫，更由於宋家與美國，與基督教，與上海資產階級等各方面的深厚關係，宋家成了一個有巨大政治影響力的象徵；再加上宋慶齡是孫中山的遺孀，人稱「國母」。因此，蔣介石下決心，不惜一切代價與宋家拉上關係，與宋美齡結親，企圖通過這種特殊的紐帶，使他的政權獲得多方面的好處。尤其是他將成為孫中山的連襟，這將有利於取得孫中山繼承人的合法地位。

為此，蔣介石向宋母說，他已與妻妾離婚，陳潔如也已去美國留學，並接受宋母的全部條件，答應先研究基督教教義，準備加入基督教。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蔣介石如願以償，在上海與宋美齡結婚，舉行隆重而奢華的典禮，震動了中外輿論界。

宋慶齡早就識破蔣介石追求她妹妹的用意，曾竭力阻止這門親事，不讓蔣介石利用她和孫中山的名義去提高南京政府的威望，況且現在蔣介石已經完全變成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但是宋美齡趁宋慶齡在國外的機會，竟然匆匆忙忙地與蔣介石結婚了。更使她失望和痛苦的是，不僅妹妹本人，而且母親和姐姐全家都背叛了她。她敬愛的母親曾與她一起反對這門親事，現在居然變卦；姐姐藹齡對蔣宋結合還起了促進作用。宋慶齡強烈譴責這門親事，認為

「這一婚姻，雙方都是出於投機」。 111

尤其使宋慶齡不能容忍的是，在蔣介石、宋美齡結婚前夕，美國一些報紙製造的一則謠言說，宋慶齡正在考慮與陳友仁結婚。對此，她受到莫大的侮辱和刺激，以致她頸上的一圈神經性頑癬，由於受刺激而頓時發作，癢得難以忍受。宋慶齡在養病中，逐漸意識到美國報紙的謠言完全是蔣介石集團的政治陰謀：他們妄圖通過這條「新聞」，宣告宋慶齡已不再為實現孫中山的遺囑而奮鬥，貶低她在世界人民中的威望，從而使人們相信蔣介石才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真正繼承人的騙局。

## 五、來自「左」的困擾

由於這一系列困擾和打擊，宋慶齡決定離開莫斯科，移居柏林。她同鄧演達、陳友仁商議決定後，又認真研究了他們的處境和今後的工作。

宋慶齡等要離開蘇聯的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政治因素。他們原來離國赴蘇的主要目的，是計畫同蘇聯領導人商量國共繼續合作，把中國的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但是，當時蘇聯共產黨正忙於解決內部的托派問題，無暇顧及中國的革命。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宋慶齡離開莫斯科前，史達林同她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裡進行

了半個多小時的談話。這次談話內容，據事後陳友仁說：宋慶齡除對蘇聯政府幾個月來的盛情招待表示衷心感謝外，再次向史達林表示中國國民黨願意和中國共產黨繼續合作，共同完成中國的民主革命。史達林則表示希望宋慶齡等能早日回國，繼續領導中國的革命；至於具體的合作辦法，共產國際及蘇聯黨和政府正在研究中，以後會隨時派人到中國來告訴他們的。這種敷衍搪塞的話，使宋慶齡等人感到失望。

此外，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後，因仇恨國民黨屠殺政策而滋長起來的「左」傾情緒，也使宋慶齡等人要求國共再度合作的希望難以實現。而且，這種「左」傾情緒使中國共產黨及其旅莫支部與宋慶齡、鄧演達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的關係也日趨緊張。一九二七年九月，以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為旗幟的南昌起義失敗時，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取消組織左派國民黨的計畫」。十一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決議，第一次左傾路線統治了全黨。這個決議肯定了九月決定，指出：「本黨認為國民黨左派組織失敗之經驗，證明國民黨的旗幟已經完全變成白色恐怖的旗幟，凡真正革命分子，只有團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之下。」<sup>112</sup>當然，在國民黨的領導權完全被反動派所篡奪，而國民黨左派又基本上被瓦解、所剩力量十分微弱的情況下，共產黨放棄國民黨的旗幟，獨立領導中國革命是完全正確的。但問題在於對國民黨不加分析，一概打倒，連對國民黨左派也完全否定。甚至一九二八年六月通過

112 《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第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的中共「六大」決議案，也認為「國民黨的各派完全是反動的」，批判鄧演達的「第三黨」是「為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工農黨」，因此號召全黨對所謂「工農黨」、「第三黨」進行鬥爭，指斥「他們是統治階級的奸細」。<sup>113</sup>實際上，這時宋慶齡與鄧演達、陳友仁發起成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以後不久，宋慶齡與鄧演達一直在一起從事政治活動。

這種思想在由米夫（新任中山大學校長、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影響下的、以陳紹禹（王明）為首的中共旅莫支部中，尤為嚴重。當時蘇共黨內對於如何繼續支持中國的革命，有兩種意見，一是仍用國共合作形式，一是拋開國民黨，全力支持共產黨。由於大革命的失敗，後一種意見佔據優勢。米夫即是這種意見的代表者之一。稍後，撤銷中山大學，把師生合併到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專門為共產黨培養幹部，就是這種意見占上風的結果。陳紹禹為此還公開發表批評孫中山三民主義的言論。這就使宋慶齡、鄧演達與共產黨的關係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中。

鑒於這種情況，宋慶齡和鄧演達、陳友仁認為繼續留在莫斯科已毫無意義，決定赴歐洲暫住，以待形勢的進一步發展。離蘇後的具體安排是，宋慶齡和鄧演達赴柏林，陳友仁去巴黎。他們提出赴德入境申請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德國外交部特發專函，去詢問社會安全帝國監察員對宋慶齡入境一事的態度。<sup>114</sup>獲得允許後，鄧演達首先去德國，宋慶齡因要去比

113 《布林塞維克》第二卷，第二期。

114 此函原件現存波茨坦國家中央檔案館，社會安全帝國監察員檔案第一百二十三號，第二百六十頁。

利時布魯塞爾參加第一次反帝同盟大會，未與鄧同行。後來又由於健康原因，一直拖到第二年五月初才去柏林。

「國際反帝大同盟」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宋慶齡和世界著名人士愛因斯坦（德國）、高爾基（蘇聯）、羅曼·羅蘭（法國）、巴比塞（法國）等人共同發起的，總部設在布魯塞爾。這次大會是國際上空前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戰爭的和平大會。宋慶齡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從而使中國革命成為全世界的一件大事，特別受到被壓迫民族和國家的注意。<sup>115</sup>在會上，宋慶齡被推選為大會名譽主席。一九二九年八月，國際第二次反帝同盟大會在德國法蘭克福舉行時，宋慶齡雖在國內未及參加，但是大會仍推選她任名譽主席。此後，宋慶齡又逐步成為反戰反法西斯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成為著名的世界和平戰士、享有盛名的國際和平及進步運動的領袖。

所以，宋慶齡此次出國訪問的意義和影響，遠遠地超過訪問的本身，它不僅開闢了一條與國民黨反動派鬥爭更加有利的戰線，而且直接把中國革命與國際鬥爭聯繫起來，開闢了一個更加廣闊的戰場。宋慶齡的立場隨之站得更高，視野也更為開闊，具有了如她所要求中國革命婦女具有的「世界眼光」。在此後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她一直把中國革命與國際鬥爭結合起來，使二者互相支援，共同前進。由於宋慶齡與國際友人廣泛的聯繫和深厚的友誼，她在

爭取國際進步力量支援中國革命方面的貢獻之巨大，是無人能相比擬的。

第一次國際反帝同盟大會開過後，宋慶齡返回莫斯科，同年三月九日，她在莫斯科親自為紀念普羅梅而設立的教育基金進行募捐活動。這項基金是為紀念普羅梅在中國大革命期間對國民政府作出的功績而設立的，基金將捐助給一所大學，作為學生補助金之用。這項活動，由宋慶齡主持最為合適，不過它的募捐活動是在莫斯科而不是在中國開展使人們感到遺憾。

這年的三月十二日是孫中山逝世三周年紀念日。這一天，原計劃安排宋慶齡參觀博物館。當蘇聯嚮導薇拉·弗拉基米羅夫娜·阿基莫娃到旅館邀請宋慶齡時，她說：「今天無論什麼參觀都不去。因為今天是孫中山逝世的日子，哪兒都不去！」說著，她聲淚俱下，在房間裡來回走動。<sup>116</sup>

這是宋慶齡對孫中山無比情深、特殊的懷念形式。

每逢三月十二日孫中山逝世和十一月十二日孫中山誕辰的紀念日子，宋慶齡都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悼念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

一般的情況是這樣的：牆壁上懸著孫中山的遺像，小圓桌上的大花瓶中插著潔白的花朵。室內雙層窗簾拉得很緊，燈光微弱，氣氛寧靜、肅穆。宋慶齡身穿黑色的衣衫，獨自一人坐在靠背椅上。她在沉思、在懷念……數十年如斯，除了有重大的紀念活動，她總是這樣獨自

116 V. V. 阿基莫娃 (V. V. Vishnyakova-Akimova) : 《在革命中國的兩年 (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英文版第二百八十四頁。

閉門默哀，不下樓，不會客，甚至對左右的人也很少說話。宋慶齡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每逢孫先生的誕辰或逝世紀念日，我不願參加這種紀念活動，因為想起他在世的情景，會難過的。」她還說：「讓我一個人靜靜默念孫先生，這樣最好！」<sup>117</sup>

不僅如此，宋慶齡對孫中山大海一樣的深情，在日常生活中也時有流露。如她吃藥時會說是孫先生教給我怎樣吃藥的；請幾位好友吃娃娃魚時，也告訴人們說，是孫先生講給我娃娃魚名稱的來歷、產地、味道等。宋慶齡對孫中山的遺物加意愛護，細心保存，處處表現出對孫中山的眷念之情。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居住時，她每天都要在孫中山坐過的椅子上坐上十分鐘。她非常珍愛一個小碗口大小的銀質相框，厚實的玻璃下鑲嵌著孫中山生前拍攝的一張二寸照片。照片已經泛黃。宋慶齡經常隨身攜帶著這個小相框，無論在上海或北京，甚至出國也帶著。每到一地住下來後，她第一件事就是把小相框擦拭得乾乾淨淨，然後端端正正地放在床頭櫃上或房裡一眼就看得見的櫃檯上。

宋慶齡幾十年如一日，這樣懷念孫中山，除了表示對孫中山一往情深之外，更重要的在於她把孫中山始終當作指導她前進的導師。孫中山對她猶如一座蘊藏豐富的寶庫。每當遇到問題和困難時，她能從這種懷念中，得到無窮無盡的力量和智慧。她在任何複雜艱險的環境中，始終高舉孫中山的革命旗幟，堅持鬥爭，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 六、在柏林研究土地問題

宋慶齡赴德是早有計劃的。一九二七年她離開武漢時，就持有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簽發的護照，並說明去德的目的是治療眼疾<sup>118</sup>（其實這不過是一個藉口，因為她的眼睛並沒有毛病）。儘管如此，德國當局對她的到來還是頗為驚慌，只給了她居留三個月（從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八日）的短期入出境簽證，並對她秘密監視。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發給宋慶齡入境簽證時，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給國內報告說：「鑒於宋慶齡女士在中國的國民運動中站在共產黨的一方所起的作用以及她與莫斯科共產黨的密切關係，我認為，應該對她在德國的活動予以秘密監視。」<sup>119</sup>為此，德國外交部正式請求社會安全帝國監察員對宋慶齡實行最周密最謹慎的秘密監視。<sup>120</sup>帝國監察員又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普魯士內政部，並且指出，宋慶齡是國際勞工組織中央的成員，在中國國民運動中和共產主義運動中影響很大，和蘇聯共產黨有密切的關係。<sup>121</sup>

118 見社會安全帝國監察員關於監視宋慶齡的總結，存波茨坦國家中央檔案館，社會安全帝國監察員檔案第一百二十五號，第十四頁。

119 見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致德國外交部的函件副本，並德國外交部致社會安全帝國監察員的函，存波茨坦國家中央檔案館，社會安全帝國監察員檔案第一百二十五號，第十二頁。

120 同上。

121 見普魯士內政部一九二八年五月五日致社會安全帝國監察員的函，存波茨坦國家中央檔案館，社會安全帝國監察員檔案第一百二十五號，第十三頁。



就這樣，宋慶齡於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正式移居柏林。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除一九二九年為參加孫中山奉安大典回國數月及在巴黎稍住外，宋慶齡在柏林度過了三年多平靜的讀書生活。「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果說宋慶齡的莫斯科之行未達目的，那麼，柏林之寓，在鄧演達的熱情幫助下，她圍繞著中國革命問題讀書和進行研究，卻大大地充實了自己。

在柏林，宋慶齡起先住在利茨恩堡大街七號沃爾夫的家中，<sup>122</sup>後來轉到風景如畫的近郊區。她的身分是保密的，連房東也只知道她姓「林」，稱她「林女士」。與在蘇聯不同，她在德國是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暫住的，所以她不想去麻煩德國政府，更不願求助於國民黨政府駐德大使館，而在雷娜·普羅梅逝世後，她身邊照顧的人也沒有了。鑒於這種情況，鄧演達與宋慶齡及陳友仁商量後，特意把在莫斯科學習和工作的章克調到柏林，住在宋慶齡所在公寓的附近。章克的任務，主要是照料宋慶齡，使她能安心在這裡居住。<sup>123</sup>

遵照宋慶齡和鄧演達的吩咐，章克每天早飯後就到柏林大學圖書館去搜集一切有關土地問題（特別是亞洲諸國的土地問題）的材料，提供給宋慶齡、鄧演達使用。十一點半左右，他到宋慶齡的住處幫助料理一些家務；中午一點左右，陪同她在康得大街中國人開的餐館就餐。他們每天吃的大都是一種德國人叫「Godeck」的菜（上海叫「公司菜」或「蓋澆飯」），大米

1 2 2 見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柏林警察局IA處的報告，現存波茨坦國家中央檔案館，社會安全帝國監察員檔案第一百二十五號，第十五頁。

1 2 3 參見章克：《宋慶齡在柏林》，未刊稿。

飯上有蔬菜、豬排或牛排，放在一隻相當大的橢圓形的菜盆裡，每份一個馬克，外加二十分小帳。生活相當節儉和艱苦。午飯後，章克陪她到商店買點東西；然後分手，章克到柏林大學附設的一個學習班去學習德語。四點鐘，他又到宋慶齡處說明她整理資料……。

124

這時，宋慶齡和鄧演達在潛心研究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他們認為這兩個問題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應該研究透徹。鄧演達的見解是，解決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貧困落後問題，即土地問題，是當前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他認為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核心思想。但是怎樣實現這一主張，還要從實際出發，就是從中國的社會結構、當前的技術水準，以及工業對農業的支援出發，逐步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社會結構的細胞是家庭，要提高農業的生產率，改善農民的生活，應著眼於農民的家庭，即提高每戶農民的積極性，所以，最好把土地分配到戶，由農民自己來經營管理。每戶農民在完成國家所規定的指標後，有權種植自己所需要的糧食或其他農作物，政府不應干涉農民的全部經濟活動。只有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富裕起來，工業所需的初級原料才有充分的保證，工業才有發展的可能。這樣，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中國一定可以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繁榮富強的國家，趕上歐美資本主義國家。

宋慶齡非常讚賞和欽佩鄧演達的這種科學的分析和對中國革命前途的設想。她後來寫的

《紀念鄧演達》一文中說：「在柏林的幾年中，有一部分國民黨員，鄧同志在其中組織了一個學會並加以領導。因為他對於歷史、經濟、哲學等學科全有淵博的知解及明銳的識斷，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獲極大的教益，並更深切瞭解中國革命前途可遭遇的種種問題。他分析世界大勢和其相互間的關係，是那般地清楚而一無疑點，解釋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又實實在在是處處引人嘆服。」更使宋慶齡感動的是鄧演達對孫中山三民主義透徹地瞭解和忠誠地實踐，成為她當時唯一的知音。她說：「對於總理的教義和政策，鄧同志是徹底地瞭解，而努力的想將其實現，並且十分明白，三民主義的實現與民族解放，各階級的公民權與自由權，及為提高全國生活水準的鬥爭，兩者是不可分離的。」<sup>125</sup>

鄧演達與宋慶齡如此認真研究土地問題，希望能擬出一個土地革命的綱領，作為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思想基礎。

由於鄧演達社會聯繫廣泛，消息靈通，他每天上午到宋慶齡處報告國內情況，研究問題。每隔一天，他還幫助她提高漢語的寫作水準。宋慶齡由於十四歲就離開中國到美國讀書，所以對寫漢語文章感到很吃力，現在正是補上這一課的好機會。因此，她要求鄧演達每隔一天，給她上漢語寫作課。鄧演達從留德的中國進步學生中借來《嚮導》、《新青年》等國內出版的進步雜誌，把陳獨秀、李大釗、恽代英寫的文章作為教材，給她講解這些文章中引證的典故

和一些成語的用法等。宋慶齡虛懷若谷，學習十分用功，經常用漢語寫出要發表的意見，請鄧演達改正，因此她在很短時間內，寫作水準有了較大的提高。所以她後來不僅能寫漂亮的英語文章，還能寫漂亮的漢語文章。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對她寫的文章評價甚高，認為是值得學習的楷模，這是與她在柏林時期下的苦功夫不開的。

奮鬥、失敗、總結、提高；再奮鬥、再總結……經過大革命失敗和在莫斯科、柏林的總結、思考，宋慶齡對事物的觀察和問題的研究更加成熟、更加深刻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記者文森特·希恩從美國到柏林，再次訪問宋慶齡。他對宋慶齡說，美國人民很想見她，聽她講講有關中國當前的真實情況。為此，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特委託他代表該公司邀請宋慶齡到美國作客，在電臺上對聽眾講幾次話，每次都只要幾分鐘。該公司為此準備付給五十萬美元的酬勞。<sup>126</sup>希恩並隨身帶來該公司擬就的有關此事的合同，如果宋慶齡同意，就可以在合同上簽字。

宋慶齡與鄧演達研究後，決定「以不去為好」。她認為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邀請不完全是商業性的，而含有濃厚的政治意義。非常明顯，美國政府希望從宋慶齡的口裡聽到幾句支援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新政權的話，或者希望由於她是蔣介石妻子的姐姐，而不會在美國人民面前公開批評蔣介石，從而默認蔣介石政權的存在和合法性。所以她斷然拒絕了

126 章克：《宋慶齡在柏林》，未刊稿。另據文森特在《個人的經歷》中說，是請宋慶齡作三十次演講，報酬是一個晚上五百美元。

到美國去的邀請。

宋慶齡深邃的洞察力和堅定的立場，使周圍的同志非常感動和欽佩，卻使希恩大大感到意外。他原以為宋慶齡無論出於當時困難的處境，還是到美國重遊故地、訪問友人，以及籌措日後的活動經費……都會樂意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邀請的。希恩是位元比較有學識的美國記者，對中國人民也友好，寫過一些比較客觀和公正的有關中國情況和大革命的報導，但是他對宋慶齡的為人還缺乏深刻的瞭解，因此，對她的決策也並非都能理解。

七月初，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趁從美國返北京之便，取道歐洲，擬會晤宋慶齡交換有關當時中國政治情況的意見。司徒雷登和宋家既相識又有較長時間的來往，他到柏林來，宋慶齡本應會見，但她考慮現在的情況是美國統治集團是站在蔣介石一邊，而不是站在中國人民一邊。像司徒雷登這樣的傳教士，歸根到底是為美國統治集團服務的。儘管他個人對中國人民比較友好，但在政治上是站在美國政府一邊，也就是站在蔣介石一邊，而不是站在中國人民一邊的。所以，她毅然讓人轉告司徒雷登說：由於近幾天身體不適，醫生不讓會客，稍後如方便再約時間會談，同時轉送他一張親自簽字的與孫中山結婚時的大照片作為紀念。

宋慶齡拒絕會見司徒雷登，也是為避免事後人們宣傳時製造謊言，混淆視聽。可是，司徒雷登後來撰寫《在華五十年》回憶錄時，還是編造出在柏林會見宋慶齡的假話，並把「斷定俄國的共產主義不是醫治中國弊病的靈驗藥方」的意見強加於宋慶齡，表現出傳教士不光彩的一面。

當時除司徒雷登外，美國還接二連三派人到柏林訪問宋慶齡，妄圖通過宋慶齡之口，使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合法化。宋慶齡都一一予以拒絕，並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對於美國傳教士或教師要有正確的認識……對於他們的花言巧語和小恩小惠都要提高警惕。」<sup>127</sup>

敵我界線分明，親疏遠近得當。宋慶齡對別有用心的人冷若冰霜，對同志和朋友則溫暖如春。她與德國政府官員很少聯繫，應德國在野黨的領袖們求見交換意見時，也都派鄧演達作為代表接談。但是，她同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的領袖蔡特金等人的來往卻十分密切，還和德國知名的民主人士、特別是作家和藝術家始終保持著廣泛的聯繫。後來回國為受迫害的革命家和民主主義者的權利和自由而鬥爭時，她經常收到發自德國的表示聲援的電報。發報人都是有名的反法西斯戰士，其中不少是她在柏林結識的朋友。後來當希特勒在德國實行法西斯專政時，宋慶齡的這些朋友受到殘酷迫害，她也積極地營救和聲援他們。

宋慶齡不承認國民黨政府，但對中國駐德大使館的工作還是關心的。在接見使館官員時，她指出使館人員深居簡出，和周圍社會接觸太少，應改變這種閉門寡聞的狀況。<sup>128</sup>宋慶齡還經常在住所裡接待來訪的中國客人，她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同胞和友人，特別是非常關懷留德學生中的進步學生，同鄧演達一起親切接見，並勉勵他們努力學習，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為以

127 章克：《宋慶齡在柏林》，未刊稿。

128 參見許惠良：《中德關係》（德文）第三十六頁，一九七七年阿森出版。關於宋慶齡與駐德使館來往情況，許惠良採訪了當時中國駐德大使館女職員龍良。

後建設自由獨立和繁榮昌盛的新中國貢獻聰明才智。

同年六月底，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宋子安在歸國途中，特繞道歐洲到柏林探望闊別四年的二姐。宋慶齡見幼弟學成歸國，無比高興。她詳細地詢問他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情況，耐心地告訴他國內的現狀，並勉勵他今後要努力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做出貢獻。宋子安則表示很理解二姐近幾年的奮鬥。宋慶齡在眾多的兄弟姐妹中，與子安的關係一直是最好的，她挽留這個幼弟在柏林住了五天，偕同他參觀遊覽名勝古跡，並親自陪他到漢堡和巴黎旅行，然後把他送上赴上海的輪船。真摯的手足之情，使周圍的人都深為感動。

宋慶齡在巴黎耽擱了一個多月，九月三日才返抵柏林，改住在柏林夏洛滕區維蘭德大街十八號科恩賴希博士夫人家裡。因為上次簽證期滿，宋慶齡重新申請。她對警察局申請說，她是來柏林求學讀書的。<sup>129</sup>

遺憾的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內「左」傾情緒日趨激烈，宋慶齡在柏林期間，與共產黨的關係更加冷淡了。她明顯地受到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及旅德支部的冷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國際反帝大同盟」在德國柏林召開會議。宋慶齡是這個同盟的發起人之一，又是該同盟的名譽主席之一。所以以往該同盟召開會議，她都在被邀請之列。但是，這次她雖然正好在柏林，卻沒有通知她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從莫斯科派出黃平和餘

129 見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柏林警察局長函，原件存放波茨坦國家中央檔案館，社會安全帝國監察員檔案第一百二十三號，第三百一十頁。

飛參加會議。黃平根據當時的「理論」，在會上發言時，竟當著鄧演達的面，說什麼「國民黨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險的敵人，因為他們還能欺騙群眾」。<sup>130</sup>會後，黃平等到康特大街中國飯館吃飯遇見宋慶齡時，雙方都視為路人，互不相打招呼。<sup>131</sup>

宋慶齡目睹共產黨內如此敵我不分，甚至為淵驅魚、認友為敵的「左」傾幼稚病，感到十分痛心。但是，這種冷遇並沒有影響宋慶齡繼續革命的熱忱。她和鄧演達在用功讀書、研究土地問題的同時，不斷接見國內的來客，密切注視中國局勢的發展。宋慶齡到柏林後不久，同濟大學數學教授鄭太朴隨太虛法師到德國講學，他向宋慶齡和鄧演達詳細介紹了國內情況：一方面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對進步人士和工農群眾的鎮壓和迫害，另一方面是各地先後爆發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但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威脅很大，使蔣介石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終日。鄭太朴的思想情緒，代表了國內中上層進步人士的傾向。他申述了國內進步人士都盼望宋慶齡和鄧演達能早日歸國，把國內的進步力量重新組織和領導起來的情形。

八月初，曾領導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的葉挺和黃琪翔先後到達柏林。他們分別會見宋慶齡和鄧演達，詳細彙報了起義的經過情況。宋慶齡從鄭太朴、葉挺和黃琪翔的彙報中，獲得了大革命失敗後國內政治情況的第一手資料，顯得非常高興，並從中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革命的火種並沒有熄滅，只是受了一些挫折；人民仍在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繼續奮鬥。問

130 黃平：《往事回憶》第六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131 同上。



題是如何把國民黨中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同志團結起來，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貫徹下去，並在革命實踐中加以完善和補充。於是，她與鄧演達、葉挺、黃琪翔反復研究後一致認為：加速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團結一切把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貫徹到底的同志，是當前的緊迫任務。為此，他們應儘快地回到祖國去。

不久，正好傳來中山陵竣工的消息，宋慶齡要回國參加孫中山奉安大典的活動。鑒於宋慶齡的身分，不便在國內進行具體的組織活動，鄧演達就派黃琪翔作為宋慶齡的秘書陪她回國，一方面照料她的旅途生活，另一方面回國進行聯絡工作，為鄧演達回國正式籌備成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做準備。<sup>132</sup>

132 參見楊逸堂：《鄧演達在國外》，載《鄧演達》第九十九頁，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鄧演達：《致丘哲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三十日和八月八日），載《鄧演達文集》第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一頁。